



为一座湖立传

□徐贵祥

科学分析。

这一切,似乎在2024年的夏天发生了变化。家乡老领导王国信同志发来了他编著的《城西湖军垦纪实》,连续数日读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哦,原来是这样的。

二

知道王国信这个名字,源于一个传说。上个世纪末,皖西发生重大水灾,凤凰卫视一名女记者采访受灾群众,问每家领到了多少救济粮。当地农民用方言回答:“吊粟子。”意思是不多。女记者听不懂这句话,茫然四顾,陪同在侧的县委办主任王国信脱口而出:“吊粟子等于5公斤”。那时我同王老未曾谋面,在钦佩他应变能力的同时,已在心里为他画了脸谱,以为他是一个善于“敷衍”的基层干部。后来打听此人的情况,同我的主观印象大相径庭,熟悉他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此人老实厚道,书卷气很浓,正因为不善投机钻营,前半生都在机关做文字工作,直到退休,还是个副县级干部。当年他说的“吊粟子等于5公斤”,并非信口搪塞,而是事实,在那样一场重大的灾难面前,每家领取第一批救济粮5公斤,讲“吊粟子”并不为过。

与同龄人相比,王国信应该算较大的知识分子了,他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师范毕业生,60年代中期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是个典型的“学习型人才”。他的人格魅力、工作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都是在学习中获取的。除了诗情画意之视觉美感;既有灾难中湖区百姓流离失所的苍凉,又有同灾难搏斗的雄阔;既有千军万马围湖造田的壮观,又有退垦还湖激动人心的场面。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城西湖军垦纪实》或许不是一本能够满足猎奇趣味的作品,但是对于一个地方、一段历史而言,却是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文献。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习惯于从

历史的褶皱里寻找文学灵感,习惯于触景生情、在语言文字的上空放飞文学梦的作者而言,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三

那么,就让我们打开《城西湖军垦纪实》(以下简称《纪实》),跟随王国信的笔尖,回到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

城西湖是一个梦,在以往的岁月,这个梦首先是噩梦,然后才是一个为民造福的美梦。据《纪实》介绍,城西湖是淮中游最大的自然湖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因淮河失修,此湖连续十二年水灾,湖区百姓家无粮、身无衣,其悲惨境况可想而知。

记得有年探亲回乡,同几个文友夜走城西湖。月色朦胧中,我顺口一溜:“远看西湖黑乎乎,近看西湖黑乎乎。有朝一日倒过来,俺们全都黑乎乎。”虽然这首打油诗是酒后即兴,但是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并不是毫无依据的。

水,是一切生命的亲人,但是,如果不把它安顿好,不让他流到该去的地方,不让他在该集中的时候集中、该分散的时候分散,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最凶恶的敌人。

事实上,城西湖自从成湖之后,湖区人民一直在同这座湖斗智斗勇,琢磨怎么化害为利,怎么同这座湖亲密相处,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它、使用它。

20世纪二三十年,鲁迅创办了“未名社”。六名成员中,有四名来自霍邱县南部的叶集镇。其中的韦丛芜(韦立人)后来回到家乡当了当时霍邱县的县长,这位写过诗集《君山》《冰块》、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等作品的诗人、翻译家,乘坐马车沿城西湖堤坝走了几遭,文学梦陡然变成了家天下的情怀。他四处奔走,筹集到30万块银圆,以诗一样的激情,要把城西湖20万亩水面改造成良田,可终因财力不足,加之设计、施工欠科学,惨遭失败。城西湖发出一声冷笑,韦丛芜落得个丢官坐牢的下场。

时光进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日子里,南京军区和安徽省委站在“平战结合,军民两利”的高度,商定联合围垦城西湖,方案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主席同意并亲自批示,南京军区先后投入四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在地方十万民工的配合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湖造田运动展开了。至此,城西湖已不再是过去的城西湖,而成为拥有十

多万亩良田的军垦农场。以往“水来成湖,水去成滩”的凶险之地,终于摇身一变,成了春天油菜飘香、秋天稻花摇曳的硕大田园,不仅解决了南京军区军需困难,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1966年4月至1986年4月,城西湖军垦农场整整存在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间,在城西湖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故事啊,人水大战、人鼠大战、人蝗大战、人疫大战,以及围湖造田初期艰难的搬迁、蓄洪紧要时刻的撤离、洪水中的军民互助,还有围湖初期堆在霍邱城关广场上像山一样金灿灿的小麦和稻谷……霍邱人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粮食,也是第一次沐浴军队带来的卫生、教育、交通、施工等方面的现代文明。二十年间,城西湖农场带给当地人民的精神文化的阳光,至今仍然投射在城西湖的上空,滋养着霍邱人民的心灵世界。

乡贤喻廷江有副楹联,生动地概括了军垦时期的城西湖:千年淮河一壶酒醉倒多少好汉,万顷碧波两片湖催熟天下粮仓。

深以为然。

四

然而,二十年后,一场激烈、持续了数年的争论之后,城西湖又成了湖。

当年围湖造田时,王国信还只是一个县直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不太可能掌握一手资料和内幕,好在他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经历,有查阅资料的便利,因此《纪实》一书对于围湖造田的起因、过程、效果和结局的阐释和描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可以负责地说,到目前为止,这种权威性是绝无仅有的。也由于文风朴实,论证严谨,这种权威性又是可信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于“备战备荒”和“以粮为纲”的需要,为了应对国际军事打击,抓住淮中游十一年一次特大洪水,可能需要蓄洪的规律,抢在两次蓄洪之间的战略机遇期,围湖造田,让沉睡的湖泥成为良田,造福军民,是一次果敢的战略行动。

时隔二十年,经过改革开放,粮食问题已不再是首要问题,世界军事格局也已发生重大变化,而围湖造田之后出现的城西湖周边水位抬高、湖洼地被淹、蓄洪存在隐患等矛盾则愈发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退垦还湖的必要性就日益彰显出来了。

说到底,无论是围湖造田还是退垦还湖,都是时代的需要,都是从实际出发。一围一

退,好比一攻一防,均是遵循客观规律、与时俱进的产物。科学地讲,没有一座湖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一块田地永远只能用于耕种。所有的文明都是从土地上生长的,所有的生长方式都不是固化的。大自然给了我们一座湖,并不是让我们墨守成规地被动接受它,反过来顺受地忍受它,而是让我们主动地用好它、管理好它,让它为人类造福。

据《纪实》披露,当年围湖造田,毛泽东主席亲自做了批示;二十年后退垦还湖,是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批准的。历史上,还有哪一座湖如此“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呢?还有哪一座湖能像城西湖那样同时代、同国家和军队的命运联系得如此密切呢?

关于退垦还湖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特别是上层决策内幕,王国信恪守秉笔直书的原则,下笔必有证据,绝不捕风捉影,绝不多说一句,绝不多写一个字,宁可罗列文献资料而不妙笔生花。我特别注意到《纪实》里面出现的一个人物,时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宣奉华女士。此人多次深入围垦后的城西湖内外采访,撰写内参文章,引起省委和中央领导的注意,这可能是撬动退垦还湖杠杆的关键支点。我对宣奉华为民请命的壮举深深敬佩,并由此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高看一眼——这是题外话了。

艾青诗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在这土地上爱得深沉……”王国信生长在城西湖乡,工作在城西湖边,是城西湖历史变迁的目击者、见证者、亲历者、知情者,对于城西湖,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情。他的心里,蕴藏着当年围湖造田的浩浩荡荡,充盈着军民携手战天斗地的壮阔;也活跃着二十年后退垦还湖的粼粼波光,闪烁着对美好未来的深情凝望。他通过《纪实》讲述城西湖一段沧桑历史,也通过这段历史表达了他的乡土诗意,以文学的方式,给后人立下一座城西湖的沧桑丰碑,可贺可敬!

今天的城西湖,还是那座城西湖吗?是,又不完全是。说它是,因为湖水又回来了,湖面又荡漾起了碧波,飞鸟掠水而过,鱼虾在荷丛中戏耍,它似乎还长着原先的那张脸。说它不完全是,因为经过围湖造田的城西湖,曾经是军垦农场的城西湖,经历过退垦还湖的城西湖,已经接受了精神洗礼,飘荡在城西湖上空,已不再是饥寒交迫和担惊受怕,而是对生活、对时代、对军队、对改革开放的感恩之情和对未来的满满信心。

做一个享受颠簸的青年

□谭健敏

高铁在茫茫暗夜中飞速穿行,没有传统火车的隆隆轰鸣声,也没有钢轮与铁轨碰撞的咣当声,只有软卧里一对分铺上下铺的夫妇细微的鼻鼾声。尽管不过是晚上8点,但窗外已漆黑一片。高铁早已离开繁华的珠海市区,正驰骋于山野间,没有路灯,没有月色,没有星光,一切都因为太快,快得让那些该有的光芒早早逃离了我的视野。一切都太快,人生何尝不如此?这一趟旅程,或许就是我彻底告别青春岁月的里程碑,或许就是为我的人生下一阶段举行的奠基礼预演。

几年前,我也曾在高铁上阅读小说打发时光,《活着》《尘埃落定》都是这样一度把我带进作者预设的神秘世界的。可今晚,就算亮着简陋的床头灯,我也无心阅读,只想望向窗外黑乎乎的世界,展开想象和回忆的翅膀,飞过去,飞到遥远的北方。闭上眼睛,也是黑暗一片,我恍如在宇宙的星辰间徜徉遨游,跨越时空的千山万水,看见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壮年。

一个多月前,我突然收到中国作协的邀请,请我去北京参加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我,一名普通医生,能代表澳门作家

吗?有资格和专业作家相聚一堂吗?我,两鬓苍苍了,还算青年吗?

作协的朋友诙谐地回答:“可以,不到45岁还算!”

我暗自笑了,不知道是庆幸还是兴奋,把头发一染,就收拾行囊,慷慨待发。

四十三年前,母亲背着刚出生的我,挎着沉重的生活用品,独自从广州乘火车到西安,探望从军的父亲——我就是这样和列车结缘的。那时候的列车大多裹着绿皮,里面总是人山人海。母亲曾说,她在列车上摆脱过人贩子的纠缠。那惊心动魄的瞬间在她嘴里居然云淡风轻,豪气万丈,让涉世不深的我对列车有一种莫名的憧憬。

上小学前,我和父母的许多光阴就是这样在绿皮火车上度过的。来来往往,日月如梭,大江南北,风雨兼程。可能就是这样的颠簸让我对那些有文学意象的景观萌生了一见钟情的感觉吧?我们不富有,但我们的家很有趣,父母在火车上不忘教我背诵唐诗和《木兰辞》,还给我讲中国历史故事。他们不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却对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许多年后,当我系统地学习文学时才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曾是文学的年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简直就是当

时年轻人的图腾,我父母自然身在其中。

然而,父母还是从文学中逐渐抽离了。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他们在现实、功利、世俗的海洋里不断拼搏。父亲从西安转业,回到家乡的小县城,生活安稳了。似乎,“颠簸”渐渐成了遥远的过去乃至奢望。他们让我学医从医,并且不太愿意我在中学阶段读文科,十七八岁的我只好从命。可是,他们不经意间埋在我心头的文学种子在我而立之年发芽了。

30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了澳门——一座离家乡新会不远的城市。这里有着迥异于广东的建筑,还有似曾相识却又有所不同的风俗人情。或许乡愁和孤单,还有对前程不可名状的惶恐,终于把心头那团文学的火焰点燃了?此后十几年,我一手拿听诊器,一手拿着笔,过着普通医生难以想象的日子。澳门这座小城珍藏了我的文学梦想,让它免遭碾碎的厄运。

这次为什么要坐软卧穿越黑夜呢?因为澳门直飞首都的最早航班也要8点才出发,到达北京已中午时分,能自由活动、参观的时间实在有限。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到珠海高铁站,从夜间出发,于清晨6点30分到达北京西站。打车去牛街饱

尝完羊肉包子和葱油饼后,我便赶到会议所在地——西直门的国二招宾馆。

8点50分,我恐怕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参会代表。恢宏的海报恍如展开臂弯,摆出欢迎和拥抱的姿态。我把行李寄存下,独自外出。那一刻,我还没法想象一个小时后的盛况——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云集宾馆大厅,许多人我素未谋面,只在翻书时看到其如雷贯耳的大名。

文学对我而言,是一种孤独的乐趣,如果被喧嚣浸润,反而削弱了它在我心中的神圣。文学,更是历史的孪生兄弟,没有历史的加持,文学的色彩也将暗淡无光。

我举手一扬,坐上了一辆网约车,径直到达南锣鼓巷。流连网红商铺不是初衷,我的雅趣在于南锣鼓巷两侧那些像鱼刺一样的胡同。在雨儿胡同里,我参观了齐白石纪念馆,我还在粟裕故居的门前肃立,行了庄严的注目礼。在后圆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里,我感慨着北国和江南水乡的天壤之别。我甚至在胡同深处窥视老北京们的生活点滴,把自拍手机架在破旧的石桌上,恬静地面向镜头,背靠漆满红漆的院门,露出久违的微笑。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好久没有

开怀大笑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时空里,在陌生的氛围中,我才终于暂时偷偷释放了自己。接下来的五个小时,我在圆明园遗址的绿荷、湖泊和石头废墟中怀古。历史的悲哀没有缠绕我,反倒是自己近日的跌宕起伏,让寂寞的心灵滋生苦涩的眼泪。

我对科幻文学、类型文学和青春文学涉猎不多,我只是个传统写作者。当夜幕降临时,我几乎是最后一个回到了国二招宾馆的青年作者。那灯火辉煌、高朋满座的场面,好像一个新世界在向我招手。

为出席正式场合,我向同行的澳门代表陆奥雷借来一件黑西服,裹在身上正合适,临时凑成的庄重终究掩盖了我正合身的仓皇。澳门人特别友善互爱,人情温暖最容易自然流露,这正是我成为澳门人、喜欢在澳门长久生活的原因。澳门没能令我停止漂泊,但能让我体会到“澳门地域虽小,澳门人的心却很大”这句话——我也把这句话说给了记者朋友。

一天走了五万步,可谓“颠簸”,但我实在是乐此不疲。为了单纯的文学爱好,总在生活的漩涡里徘徊、跳跃,我想,享受这份“颠簸”的我还能再做一回青年啊!